

# 论宫本百合子的反战思想

——以《那一年》和《播州平野》为中心

于海鹏<sup>1,2</sup>

(1. 吉林大学 外国语学院, 长春 130012; 2. 浙江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无论是在二战爆发之前,战争期间抑或是二战结束之后,宫本百合子始终坚持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发动的不义战争进行抵抗,通过小说、评论、日记等载体,表达出对于发动战争的军国主义政府的痛恨,对于战争而遭受伤害的人们的同情,以及对于战争所带来的人性摧残的强烈控诉。与沉溺于强调战争给日本国民带来伤害的其他日本作家不同,宫本百合子清晰地认识到了日本在二战中所扮演的侵略者角色,同时,其反战还与民主运动和女性解放运动联系起来。即使在二战结束之后,宫本百合子仍旧不遗余力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不义本质,为预防战争的再次爆发敲响警钟。

**关键词:**宫本百合子;反战思想;《那一年》;《播州平野》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5)03-0024-06

## A Thesis on Yuriko Miyamoto's Anti-War Thought

—Centered on *Sonotosi* and *Bansyuuheiya*

YU Hai-peng<sup>1,2</sup>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Zhejiang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Whether it was before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I, during the war or after World War II, Miyamoto Yuriko, always adhering to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unjust war started by Japanese fascist militarism, through the novel, comments, diaries and other carriers, expressed the hatred for war militarism government, the sympathy for the suffered people due to the war and a strong complaints against the war causing humanity devastation. Different with the other Japanese writers who indulged in that war bringing about harm to the Japanese people, Miyamoto Yuriko clearly recognized the role of the Japanese as invaders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associated herself with the democracy movement and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Even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Miyamoto Yuriko still spared no effort to expose the evil nature of the Japanese militarists that had launched the war, and sounded the alarm against the recurrence of preventive wars.

**Key words:** Yuriko Miyamoto; anti-war thought; *Sonotosi*; *Bansyuuheiya*

收稿日期:2015-02-15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宫本百合子反战思想研究”(2014Z076)

作者简介:于海鹏,男,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日本文学及中日比较文学研究。

## —

关于日本的反战文学,中日两国学界已有诸多研究,但由于这些研究所依据的材料大多是日本作家在战后所创作的文章或著作,再加上大多数日本作家在战争期间表现出来的妥协,因而日本反战文学的真实性一直受到质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王向远的观点,他以日本与德国作家群在二战时期的不同表现为依据,对“日本反战文学”的概念提出批判,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有过‘反战文学’,但从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一直到战败期间,整个文坛全面军国主义化。”……日本并不存在真正的“反战文学”,其理由是:“一句话,在战争中不反战,就不是真正的反战;不是在战争中写作和发表的‘反战文学’,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反战文学’。”<sup>[1]</sup>这种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日本文坛在战争期间的软弱与无力,引导我们对于日本的反战文学重新进行审视和界定。不过,由于此种观点在论据构成上存在偏颇,并没有完全涵盖二战时期的全部作品,因此所得结论也存在商榷之处。

研读相关资料不难发现,从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至1945年日本战败的这段时期,无论是日本的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抑或是士兵、战俘、甚至流亡到国外的日本人中都存在着反战情绪。虽然日本国内文坛在战时体制下呈现出全面军国主义化的倾向,之前反战的无产阶级文学者也因为日本法西斯的残酷压迫和自身的软弱而纷纷“转向”,但是,日本文坛仍然存在着反战的文学和声音。例如,“考普”<sup>①</sup>作家田畑秀雄在1938年2月第11期的《密勒氏评论报》上,旗帜鲜明地发表了著名的政论——《停止侵华战争吧!》,作家西川在《团结我们所有的反战力量吧!》中写道:“日本人民的穷困,完全是由于巨额军费所致,……虽然日本军阀口声声说满洲是一个天堂,实则无论对于中国农民也罢,对于日本的屯垦工农也罢,都是一个地狱,……我们不能再忍耐了,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发动反对侵华的反战运动。”<sup>[2]10-11</sup>作家金田也在他所著的《什么叫做人民阵线运动》中明确主张:“战争招来一切的破坏。我们号召全国的同胞,所有的职业会社、劳工组织、农民组织、宗教团体、及其他一切的反战组织,建立反战的人民战线。”<sup>[2]11</sup>诚然,我们不能夸大这些反战的文学和声音所拥有的效力,也承认日本反战文学在数量上并不多,传播范围也极其有限,但也应该看到这些作品是作家们冒着被投狱和牺牲的危险,在日本法西斯残酷镇压下创作和发表的,更不能因为文化、地理等各方面的客观限制而否定日本反战文学的存在。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反战文学作家中,宫本百合子可以称作是一个典型代表。

## 二

宫本百合子之所以能被称作是日本反战文学的典型代表,原因在于即使处于战争期间,在诸多作家屈从于法西斯政府的高压统治,或保持沉默或协助战争的背景下,百合子依然旗帜鲜明地表达出对于发动战争的法西斯政权以及战争本身的憎恶和批判。1933年,日本法西斯政权发动“5·10焚书事件”,并以此为契机疯狂地推进军国主义进程。为了进一步镇压和统治国民的思想,加强对文学、艺术等思想层面的控制,法西斯政权建立起严格的作品发表审查制度,野蛮地删改、甚至查禁文学作品,作品发表受到严格限制,整个文坛面临严重危机。对此,川端康成曾感叹道:“可以看出右翼势力正在促

<sup>①</sup>前身为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简称纳普),1931年改组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简称考普)。

使政府检察官检查得更加严格,使得杂志被删除的更多,这也是世道黯淡的原因之一。”<sup>①</sup>除此之外,法西斯当局还规定:凡参加无产阶级文学或者进步文学运动的作家,只要承认加入了非法组织,停止参加政治活动,就可以继续进行文学活动。不久之后,日共领导人佐野学、锅山贞亲两人,在狱中联名发表“转向声明”,并刊登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改造》和《文艺春秋》两本杂志上。截止1935年末,“转向”者多达90%,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和反战文学运动因此遭受重大打击。1937年8月,“军部内阁情报委员会”升格为“内阁情报部”,进一步加强战时体制下对于文化界的管制,为了给军队鼓舞士气和动员国民入伍参战,甚至将部分作家强征入伍。8月底,随着以林房雄、吉屋信子等作为主要成员的第一支“笔部队”进入战场,日本文坛正式演变为以法西斯军部意志为指导的“战场文学”,而反对战争或者不为战争服务的文学则遭到阉割或镇压。

宫本百合子作为无产阶级文学作家,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痛苦,她与丈夫宫本显治结婚仅两个月,就因为政府镇压“考普”而遭到检举,被关押80余天,显治作为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也被迫转入地下工作。1933年12月,宫本显治也遭到检举,此后被法西斯政府关押长达13年,直到战争结束夫妻二人才得以团聚。在显治被关押的这段时期,百合子本人也数次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罪名,多次遭到检举并被投入狱中。1934和1936年被关押期间,母亲和父亲先后离世,百合子只是在母亲临终前15分钟才见到她最后一面。1942年被关押时,她因为酷热中暑而导致人事不省,濒临死亡,康复之后视力长时间没有恢复,而且并发了语言障碍和心脏衰弱等症状。此外,百合子从1938年1月开始便受到了来自于内务省警保局实质意义上的禁止写作处罚,失去了经济上的稳定保障,直到1939年6月,以军需生产为中心的日本经济出现“军需通货膨胀”,间接刺激了出版业的发展,政府因此适度放开了审查,百合子才得以重新写作,作品《那一年》就是在这个阶段创作出来的,而1941年1月,百合子再次被禁止发表作品。即使面临着如此的困境,她依然坚强地站在反对战争的行列,对战争进行严厉地批判。

### 三

宫本百合子的反战思想以1937年侵华战争的爆发为节点可以分为侵华战争爆发之前、1937年到1945年二战期间、以及二战结束之后的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百合子的反战思想有着不同的表现。侵华战争之前的百合子,其反战思想主要表现在《伸子》(1924年)和《飞机下的村子》(1931年)两部作品中。她在《伸子》中写道:“(当听到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时)伸子因为激动而差点哭出声来。……尽管如此,这种血腥的杀人事件真的会就此永远地结束吗?”<sup>[3]</sup>《飞机下的村子》则描写了村子里唯一的一条道路被军马毁坏,就连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要去参加修路时的场景。作品中虽然没有明确的情绪表达,但依然清晰地显示出战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破坏。这个阶段的百合子对于战争的反对只是出于人类的本能,并未对战争的危害和正义与否做出过多的判断,但是凭借对于社会敏锐的阅读能力,她预感到了战争在日本爆发和扩大的可能。

第二个阶段,随着战争的进行和所处环境的改变,百合子深切地体会到战争带来的灾难,开始明确地反对战争。但是,因为当时处于日本法西斯政府的文化压制之下,仅有《那一年》(1939年)和《广场》(1939年)等部分作品通过审核。在《那一年》中,百合子写道:“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村里面有四十多人被迫踏上了征途。也有人很快变成了骨灰,被放进白色的木头盒子里送了回来。”<sup>[4]273</sup>众多鲜

<sup>①</sup>参见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全集》:第三十一卷.东京:新潮社1984版,第413-414页.另:此处及以下所引日文资料原文均为日文,中文表达系作者翻译,文责自负。

活的生命在战争中迅速逝去,只留下了冰冷的骨灰盒带给人们无尽的哀伤。小说《广场》则在审查时被删减了一部分(战后的版本重新增添进去),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唱这首歌呀!”<sup>[5]</sup>这句话从表面来看并不具有任何反战的意味,但通读全文就会发现“这首歌”所歌颂的是苏联青年对于和平与自由的期盼,而恰恰是战争夺走了人们的和平与自由,带来了灾难与压迫。这个阶段百合子的反战因为严格的审查制度,只能隐晦地蕴含在语言的运用和客观事实的描写之中。

二战结束之后的第三个阶段,由于反动政府的垮台,人民重获民主和自由。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百合子创作并发表了小说《播州平野》(1946年)、《风知草》(1946年)以及大量的评论对战争进行批判,深刻地揭露了战争的罪恶和带给人民的苦难。小说《播州平野》与《风知草》被认为是:“为了对于日本所有的人们来说,都无法忘却的、因为治安维持法和战争而牺牲的理性与善意而创作的,不论生存或者死亡,为了因为这两种厄运而遭受破坏的人性的恢复与未来的胜利而创作的。”<sup>[6]</sup>百合子通过直接描写战后初期日本的满目疮痍,凸显出战争带给日本国民的巨大伤害,“溃败列车”“残废军人”“人性丧失”都是这种伤害的具体表现。同样,百合子还在《我们不能放开和平》《战争夺走了我们的一切》等评论中,直抒胸臆地表达出勿忘战争的伤害,警惕战争再次爆发的呼吁。

上述三个阶段中,宫本百合子的反战思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发动不义战争的反动政府进行批判。她在《战争和女性作家》写道:“迄今为止的日本已经习惯了一直以来的、由政府决定的战争,在天皇制的封建性、绝对性的教育之下,人们把战争当做是‘比思想更严重的灾难’,毫无批判性地服从下来,并且导致了今天的悲惨境地”<sup>[7]</sup>,由此可以看出作者认为战争的发动完全是政府的责任,是天皇的责任。同时,反动政府所推行的“治安维持法”更是受到了百合子的抵制和反抗,“在大约十四年的时间里,日本的治安维持法,引入了纳粹的预防拘留所体系,连一丝自由呼吸的空隙都不给我们。”<sup>[8]13-14</sup>正是因为法西斯政府发动战争并且为推动战争的进行颁布了一系列镇压民众的反抗情绪、为战争进行鼓吹的法令才使得日本国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同样也使得作为反战作家的宫本百合子及其从属的无产阶级文学组织经历了严重的灾难。

其次,是对于那些因为战争而遭遇不幸的人们的同情。在《那一年》中,百合子描写了一位被迫送儿子上战场的母亲发出的哀鸣:“茂登不想把逐渐淤积在胸口的苦闷融化在眼泪之中,她声音和眼神仿佛带上了发怒时的力气,大声地喊道:‘一定,一定要活着呀!’”<sup>[4]269</sup>《播州平野》中,丈夫重吉一家因为战争变得极度悲惨:重吉被投入监狱,二弟进三被迫入伍,四年来杳无音信,三弟直次生死不明,最后得知因为原子弹爆炸死于广岛,家中只剩下直次的妻子艳子和年迈的婆婆,带着两个孩子凄惨度日。重吉的家庭,只是日本众多家庭的缩影,原本作为家庭支柱的男人们因为战争的原因不得被迫踏上征途,“连年的战争,从这片土地上把生于斯养于斯的年轻人,一个不剩地带到了别的地方(打仗)。”<sup>[8]104</sup>。以外,日本国民在承受着饥饿、空袭以及伤病等不幸的同时,还要受到法西斯政权的压迫,从根本上被夺去了生存的希望,而寡妇村、伤残的士兵和废墟等描写战争给人民带来伤害的词汇则在作品中随处可见。

再次,是战争对于人性的摧残。在《播州平野》中,当战败的消息传出之后,被失望和不满情绪所支配的士兵,出现了哄抢军用物资拿到黑市去贩卖,从而谋取暴利的情形。宏子在去往山口的列车上遇到的残废军人,左腿从大腿部位被切断了,不仅肉体上受到了伤害,精神上也承受着煎熬,对以后的生活充满迷茫。普通民众也因为战争变得面目皆非,直次的妻子艳子原本是位天真无邪的女性,但因为战争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和煎熬,变得歇斯底里。在车站遇到的列车员,因为长期“在机枪的威慑下努力地工作”,性格变得极其古怪。百合子在战后发表的《被战争摧毁的人性》中写道:“害怕走夜路,害怕那些向自己搭话的人们,害怕那些下雨天邀请自己共撑一把伞的人们,那样的社会生活是多么的可悲

呀。战争这种东西,不仅战争本身是残酷的,还因为被战争摧毁的人性,仅仅是把在动物性意义上的生命残留下来归还给我们,无论是对于那些人还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情呀!我反对战争!”<sup>[9]</sup>

宫本百合子的反战除了表现战争的伤害之外,还在作品中充分把反战与民主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联系起来。比如《播州平野》中描写的因为年轻军官的傲慢而引起的列车长的不满,反映了军人在战争时期养成的恶习随着战争的结束受到了人民的抵制,同时凸显出战后人民民主意识的恢复。百合子的作品还大量涉及到女性角色,如《那一年》中的茂登、《晨风》中的阿彩、《播州平野》中的艳子等,从母亲、家人以及妻子的不同角色来感受战争,为之后的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顺利的过渡。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百合子的反战并不像其他作家那样,过分地强调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伤害,而是正确地认识到了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不义角色。日本军国主义所发动的战争,不仅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周边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播州平野》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朝鲜的年轻人,在战争期间以自愿的名义强制他们从军,那些不愿意从军的年轻人,父母就被抓进监狱。那种事情宏子也曾听说过”<sup>[8]163</sup>,与战后整个日本的一片凄惨相对比,被解放的朝鲜人民则是欢欣鼓舞地返回故乡,这也从不同的角度显示出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

#### 四

宫本百合子之所以会产生反战思想,大致可以从以下三层原因进行解释。首先,百合子反对战争是因为她自己的切身体验引发了对于战争的痛恨。因为反动政府的政策,她本人不能从事心爱的写作事业,长期处于禁止作品发表阶段;从1932到1942约10年间她6次被检举入狱(第3次被检举时,因为母亲病危而分为两次执行),身患重症,濒临死亡;自己深爱的丈夫和革命伙伴宫本显治(从战后作品《风知草》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对丈夫的热爱)长期被关押在牢房之中,受尽非人虐待,丈夫的两个弟弟被反动政府送上战争,尸骨不存,只留下年迈的婆婆和弟媳抚养两个幼儿艰难度日;百合子在去迎接丈夫的路途中所看到因为战争而带来的伤害,更是激起了她对战争的痛恨。通过心理学共情理论我们得知:“当个体面对(或想象)一个或多个个体的情绪情景时,首先产生与他人情绪情感的共享,……从而产生的一种伴随相应行为(外量或内隐行为)的情绪情感反应,且主体将这种情绪情感和行为指向客体的心理过程。”<sup>[10]</sup>自身的经历和外在的刺激构成合力,促使百合子走上反战的道路。

其次,是因为对于共产主义信仰的坚持。宫本百合子在苏联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30年回国后不久,加入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并于第二年10月加入非法状态下的日本共产党。日本共产党认为:法西斯政府所发动的对外战争是为了转移民主运动和经济危机等国内矛盾,维护其统治而采取的手段,因此日本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文学在“转向”之前发起了反对战争的文学运动。如,日本左翼作家联合会刊发的《反对战争的战争》(1928)和黑岛传治的《武装的街道》(1930)都是当时的代表作品。虽然之后由于日本法西斯主义军部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左翼文坛进行了残酷镇压,大批日共干部和作家被迫宣布“转向”,但是,宫本百合子仍然坚持共产主义的信仰,绝不屈从于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在守护共产主义信仰的同时坚决地进行反战。

最后,是因为作家本身所具有的人道主义思想。宫本百合子文学的出发点是人道主义思想浓厚的《贫穷的人们》,在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俄国人道主义作家群和日本“白桦派”文学感召下,百合子以自己在日本东北地区的切身体验为材料,展示出其天性中的善良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人道主义思想不仅成就了百合子的处女作,而且随着作家个人体验的丰富,逐渐演变为女性解放以及共产主义思想,成为了贯穿百合子人生以及文学的底流思想。这种思想在战争期间被人们所遭受的痛苦再次激发,引

起了她对于战争的思考,并对战争产生了强烈的痛恨。《播州平野》中写道:“宏子仿佛发抖一样念叨着,少年士兵呀,请不要在中途死掉呀!”<sup>[8]</sup><sup>165</sup> 战争需要兵员,当日本在这场对外侵略的非正义战争中屠杀他国人民的同时,本国的青壮年、至少少年的生命也被战争所吞噬。宫本百合子看到了战争带给日本国民的极大负担和精神痛苦,人民不仅丧失了劳动力和经济来源,还要为失去亲人而悲痛不已。战争的毁灭性和非人道与以“善”和“爱”为最高目标的人道主义产生强烈的冲突,促使百合子以笔墨为刀枪对抗这场非人道的战争。

## 五

日本的反战文学因为其文学传统和自身文化的限制,并未表现出与二战期间德、意两个国家相似的彻底反战的局面。在传统的日本文化中,战争是为了君主、为了爱国进行的,其忠义和爱国观念则是建立在对于统治者的绝对服从的基础上,缺乏正义感和伦理道德因素,这也就是为何日本学者中江兆民会说“日本从古至今一直都没有哲学”的原因之一。同时,由于日本文学存在着“他们不是从广阔的社会视野出发,而是根据个人内在的意识活动来把握客观存在的事物”<sup>[11]</sup>的传统,再加上在战后对战争进行反思的作品中,往往是从受害者的立场,沉溺于战争给日本人民造成的伤害,暧昧地讲述日本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造成了学界对于日本反战文学的怀疑和不满。

但是,宫本百合子却是一个特例。她不仅在战争未爆发之前,就表现出对于战争的厌恶和对于战争即将爆发的担忧,还在战争期间法西斯政府严密的审查制度下,通过小说、评论、以及书信等作品隐晦地表达出对于战争的痛恨。同时,坚守共产主义信仰,拒绝向日本法西斯政权屈服。在战后不久发表了小说《播州平野》《风知草》及大量呼吁和平的评论,宣传反战思想,为日本的民主和平运动摇旗呐喊,防止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即使在人生的末期,百合子依然表达出不要战争,希望和平的愿望。她在《世界希望和平》中写道:“这个世界上有着成千上万的寡妇、孤儿以及战争受害者,这些人们都不希望有战争。全世界想要使这个社会得到发展的女性不希望战争的再次爆发,她们的眼泪传递给我这样一种信息。”<sup>[12]</sup> 呼吁人们热爱和维护和平,阻止战争的再次发生。

### 参考文献:

- [1]王向远.日本有“反战文学”吗?[J].外国文学评论,1999(1):5-12.
- [2]宋斐如.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M].汉口:生活书店,1938.
- [3]宫本百合子.伸子[M]//宫本百合子.宫本百合子全集:第三卷.东京:新日本出版社,1979:32.
- [4]宫本百合子.那一年[M]//宫本百合子.宫本百合子全集:第五卷.东京:新日本出版社,1979.
- [5]宫本百合子.广场[M]//宫本百合子.宫本百合子全集:第五卷.东京:新日本出版社,1979:354.
- [6]千头刚.战后文学的作家们[M].大阪:关西书院,1995:87.
- [7]宫本百合子.战争与女性作家[M]//宫本百合子.宫本百合子全集:第十三卷.东京:新日本出版社,1979:281.
- [8]宫本百合子.播州平野[M]//宫本百合子.宫本百合子全集:第六卷.东京:新日本出版社,1979.
- [9]宫本百合子.被战争毁灭的人性[M]//宫本百合子.宫本百合子全集:第十六卷.东京:新日本出版社,1979:116.
- [10]刘聪慧.共情的相关理论评述及动态模型探新[J].心理科学进展,2009(5):964-972.
- [11]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52.
- [12]宫本百合子.世界希望和平[M]//宫本百合子.宫本百合子全集:第十七卷.东京:新日本出版社,1979:745.